

邪恶

苍天在上

陆天明◎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苍天在上

◎陆天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天在上 / 陆天明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404-4232-3

I. 苍… II. 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55991号

苍天在上

陆天明 著

出 版 人: 刘清华

项目策划: 周艺文 简以宁

责任编辑: 崔灿

装帧设计: 郭志科 彭意明

统 筹: 蔡亚林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新华书店

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

印制: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 / 32

字数: 350千字

印张: 11.5 印数: 1-14,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04-4232-3

版次: 2008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4.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服务电话: 0731—2801361

我的文学三十年祭(代序)

陆天明

三十年了。

我的文学创作又走过了三十年的路。

是“一竿风月”，还是“一簑烟雨”，抑或是“波涛万顷”？

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说我要当“作家”。我上学早。写作文的那年我七岁。我那个被多年的肺病已经折磨得几乎要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父亲，看到我的那篇作文，非常欣慰地说：“好啊。我儿子也想当作家了。”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要当作家。但不幸的是，他是巴金笔下“觉新”式的人物，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子，终归屈服于生活的压力，为了顾全家族的生活“大局”，无论哪方面，都“痛苦”而又“自觉”地放弃了他个人的理想。

三年后，他死了。还是死于肺病。死的时候才三十岁。

在此之前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他曾经想当一个作家，并不能体会那天晚上他站在写作文的我身后，所发出的那一声喟叹里所饱含的全部伤感意味。也许他活着时，觉得我太小，就没想到还有那个必要跟我细细地说说这些。

又过了十年，我离开上海，离开母亲，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母亲为我准备行装。全部的行装就是一个旧帆布箱和一个旧铺盖卷。她却把父亲十九岁时发表的一些小说和诗歌，还有抗战时期他流亡昆明一路上写的日记当作唯一的“遗产”放进了我的行李里。

我这才知道自己和毕生经商的父亲在精神上一度是多么的接近。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挣扎生涯，让我觉出许多的心酸和沉重。所幸我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变革的大洪流中去了。我可以活得和父亲不一样。虽然，我也曾得过肺结核（是父亲传染给我的？说不清），但我可以不再用一个“旧时日肺癆病人”和“只属于一个大家族”那样的苍白软弱和绝望去处置自己的一生，去处置自己的文学梦。

大西北农场难以想象的艰苦贫瘠，不仅让人同样难以想象地彻底治好了我的肺结核，还给我心底铸进了西北汉子常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大概就是因了这种“倔强和愚拙”，农场十二年，我一次又一次主动放弃了种种充满另一类诱惑的人生选择，执着地在那戈壁荒漠上做着文学梦。

一九七三年，在到农场的第十个年头，我终于写出了平生第一部“大作品”，一个知青题材的四幕话剧《扬帆万里》。这部作品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西安电影制片厂要将它拍摄成电影。上海要发表它。兰州北京西安乌鲁木齐以及东北和别的一些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剧团将它搬上舞台演出。其实那时候，我一共只看过三个国产的剧本：《槐树庄》《第二个春天》和《年青的一代》。只看过一个话剧演出，还是那个永远激动我的《年青的一代》。那还是在离开上海前看的。后来在农场宣教组仓库里，翻拣到一本契诃夫的戏剧集，半本易卜生的剧本集。记得当时反反复复地读，一直到把它们读破。也就是像罗兰·巴特说的那种“抬头阅读”，读一段，抬起头来默想细究，“将其切割，亦因迷恋，又将其恢复，并从中汲取营养……”我的倔强和愚拙，同时也体现在：我写作，只是觉得自己心里有话要说，要对这个世界表白什么。我要叫喊。要喊出属于我的那一声来。在底层的十多年生活，面对这个世界，我总觉得自己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声音要发出。

总是直觉到，这个世界需要这样一种声音。这愿望，这直觉，这冲动和向往极其真诚而又无比强烈。甚至强过初恋时的那种可以说无与伦比的冲动和向往。至于这样喊出的“声音”是否时下或教科书上界定的那种“文学”，我不管。也许正是因了这种愚拙的真诚，我的这第一部“大作品”在当时确实打动了不少的人。后来，也是因了这部作品，我才被北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看上，把我全家调进北京。我也因此开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专业创作生涯。

但我创作上真正的新生，却开始于“四人帮”倒台。“四人帮”倒台，让起步于“文革”期间的我，有可能开始一场彻底的“蜕变”。这对我个人，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在精神上，具有哈姆雷特式的“绝对意义”：“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道必须跨过去的大坎。当文学艺术的春天重归人间，文学艺术创作将充满艺术个性地回归到它的本真意义上来。因为时代使然，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一度失去过，或者说忽略过自我和艺术个性，而要重新找回自我，谈何容易！要重新确定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同样“谈何容易”啊！我们必须像幼蛇蜕变那样，从紧紧包裹束缚着自己的“旧壳”中蠕动挣脱出来，必须先用锋利的“手术刀”细细地解剖自己。需要认真地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而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恰恰是认识自己和认识“人”这样一种最复杂又最完美的“东西”。是自己拿着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自己的肌肤。是舐食自己的血水，以此去重新获取新生的力量。

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彻彻底底地沉到一个钢厂里去生活。每天跟着工人三班倒，春夏秋冬、日日夜夜，以重新获得普通人的生存感觉，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重新认识眼前的这个世界，借此来摆脱那个旧我。同时又大量阅读能找到的新小说、新理论著作。并且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桑那高地的太阳》，用它来回顾自己这一代人是怎么失去自我

的，以从容告别过去。然后又写了那个《泥日》，以确立自己新的创作定位。学会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只凭自己的心灵感觉和感悟去创作。寻找一种完全属于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的创作风格，力图发出一种只有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才发得出的声音。迈出这沉重而又必需的一步，找回创作上的自我，我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那时我已经快四十岁了……

不蜕变便会被阉割。“是活着，还是死去？”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坚持着写下来，还是得归功于自己那个最原始的创作动机：要对这个世界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同时也要归功于一种最本真的生命动因：视天下为己任。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总结和必须加以纠正的。但是，我们幸运地从时代那儿获取了汇聚了又胶结了这样一种热源，把文学创作和民族命运、人民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样，就没有人能挡住一个男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和每一代的年轻人一样，都做过一些错事，但许多事情我们是在自己心里的真实感受驱使下去做的。错了，也该由我们自己来负责。我们的灵魂是真实的，是完全可以面对历史的。我始终坚信，文学必须属于人民，是应该也是能够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它可以发挥的那一点作用的。我们不能把文学创作所必需的个性化，扩大到，以至于极端化到私人化隐私化的地步，更不能因此极端地认为，文学只有在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完全不讲它的社会功用和大众阅读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它的升华。这也是我在发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开始萎软苍白，决定实现我自己创作的第二次回归——向现实回归，向大众回归的主要原因。它让我在整个中国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下决心要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去参与这场变革。即便这样的写作被一些先锋的“理论家”冷落过，也丝毫不能动摇我继续实现这二次回归的决心。这样的

作品，最典型的就《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这几部作品，严肃，沉重，朴实，没有任何时尚元素和花哨的个性玩弄，却在大众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一版再版，印数已达几十万，至今还在不断的再版中，不仅被收到各种集子里，还被改编成电视剧、舞台剧。由它们而拍成的电视剧，播出时，最高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九……即便如此，我并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我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曾经被那些“理论权威”冷落，而是以我的文学感觉和文学本真的意义去衡量，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既被自己的人民认可，又在文学史的进程中有创造性的突破。中国的文学产生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又要让它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它能够发挥的应该发挥的那点作用，就不能回避我们大众的阅读接受程度。它应该是既深刻，又好读，既文学，又大众，既充满着深层次的形而上意味，又洋溢着当代的生活气息，既有作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独立思考的张力，又具有涵盖时代和历史的广度和深度……我知道我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我将继续努力。我的《木凸》《黑雀群》《高纬度颤栗》，包括最近创作的《命运》，都属于在向这个目标靠拢的尝试之作。我在一点一点地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一定要再向前跨那么一大步，使自己的创作真正接近这个目标……

这些年，我常常深夜扪心自问：天明，你在变吗？你变了吗？是的，我在变。我变了。我不断地在变。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感让我不能重复自己，不能在原地踏步。我必须在变。但我又没有变。我要求自己不变。不变的是，我希望自己永远能够以一个“热血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出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那样真切地关注着，并全身心地融入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为争取更加美好未来的奋斗中去，虽然老之将至，老已降至，我必将不可挽回地衰老……一天比

一天地衰老……

去年，我回老家南通一次。到墓园去看望了父亲。一个六十岁的儿子去祭扫三十岁的父亲。看着极其简陋粗糙的水泥墓碑上他那个极年轻极清瘦极忧郁极聪慧又极无奈的神情，我哽咽了。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父亲，你儿子终于成了一个作家了。”这话好像三十年前就该说了。“我还会写下去的，直到把心里要说的那些话都说出来为止。”这话好像也不准确，只要你关注人民的命运，心里的话有说得完的那一刻吗？“我知道自己还没写出最好的作品，为此，我将不懈努力。”几十年了，还用得着来对父亲表这个态吗？三十岁的父亲早就了解自己这个六十岁的儿子：他一生的努力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而不惜一切。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生存努力。我和我妹妹，我和我儿子，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们，和我那些亲爱的读者们，我和所有还活着的中国人，中国的平民大众，我母亲，我弟弟，我亲戚和非亲戚们……我们不曾放弃，也不会就此止步，为了两代人的强国梦，为了那两个世纪的复兴之路……我将持续地用我固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写下去，而不管别人会说些什么！

黄江北曾预料，四十五岁以前，自己还会接受一次关键性的重要任命。但没料想这次任命竟然来得这么“突然”，这么急迫，并直接牵涉到自己的故乡城市章台市。更想不到的是，为了这次任命，省委五个常委居然一起召见自己，集体跟他谈话。办公厅派六个缸的大奥迪专程到工地上来接他，到省委大楼时已是午夜两点三十分。上楼。拐弯。再上楼。再拐弯。一推门，显得异常疲乏的常委们已正襟危坐地等着了。谈话便从午夜两点四十五分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六点左右。

关于这次谈话，省委后来是这样向中央报告的：

十天前，我省章台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在侦破市住宅总公司总经理肖长海贪污贿赂案时，意外地获得了该市女市长、著名女劳模董秀娟同案受贿八万五千元的确凿证据。两天后，经省政法委和省检察院批准，决定对董秀娟立案侦查，并对其进行刑事拘留。但是，等反贪局的同志赶到董家，这个六七十年代曾闻名于省内外的女劳模，却已死在了自己的卧室里。死因不明。为此，省委决定从千里之外的中美化学联合公司工地上，急调年仅四十二岁的工程副总指挥黄江北去章台，代理市长一职……

如此这般。

等等等等。

二

四十二岁，对一个男人来说，应该要算是一生中最威猛、最风光、

最能左右逢源上下周旋的时候。这时，老的不会因为你太嫩而不屑理你，小的也不会因为你太古板而远远地躲着你。老的会因为你比他们年轻而把他们已难以挑起来的担子交付给你，而小的却会因为你比他们成熟而把自己一般不肯赐人的信任赐予你。于是你就成了不可或缺的社会胶合剂，粘连着继承着创造着综合着开启着，你便众目睽睽，众望所归，又是众矢之的。四十二岁，它先天就具有最大热交换系数，最优价格性能比，最强的啮合力和最大扭矩。无论是咬别人或咬自己，都准能一口见血。除非有病。

生理上？心理上？人格上？能力上？

三

但黄江北没病。

四

黄江北：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三日，生于章台市老城区一个铁路员工聚居的大杂院里。

一九六七年，毕业于章台市五公区第三中学。

一九六九年在插队期间参军。

一九七三年退伍，主动要求去内蒙劳动。在那并非全是“金牧场”的地方，当过牧民、工人、车间技术员、车间副主任、技术科副科长。

一九七七年考入清华大学地球物理系。在校期间任校学生会副主席。

一九八二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攻读中国哲学。一九八五年放弃留京名额，主动要求回本省工作，先后任省委党校教员、临水市重型机械厂副厂长、临水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一九八九年，调中美化学联合公司工地，任工程副总指挥至今。

该同志一九六五年在章台市五公区第三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七三年在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

省委孙书记说，很抱歉，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本来怎么着也应该事先派人去征求一下你个人的意见，再给你一点时间，慎重考虑考虑，但现在没时间再走这正常程序了。局面已经形成。省委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你就别再犹豫了。干吧。省委是了解你的。也一定会支持你的。我们已经跟章台市委和林成森同志打过招呼了。你就走马上任吧。

六

燥热。

他敞开大衣。

省委大院里一些熟识的、不熟识的或半熟不熟的同志，纷纷上前来祝贺。他谦和地应付了一阵，赶快上了那辆乳白色的桑塔纳，向西大街驰去。

七

西大街，行人稀拉，阳光稀薄，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有一辆布满尘土的老式公共车从这儿开过。他又一次看到那个牵着狗的少妇在横穿马路。她中等身材，总穿着一身滚花边的白绵绸睡衣，剪着那种似男孩、又不全似男孩式的短发。一双极秀气的脚，趿在一双毛茸茸的拖鞋里。那身白绵绸睡衣相当单薄，剪裁是那样的合体，把她那极为匀称的身材勾勒得轮廓线条分明。她回过头来看他，他觉得她是认真的。后来她就不见了。后来又会在不该她出现的地方出现。后来就回过头来，静静地看着他。她是那样的白净，好像永远不会沾染这尘世的灰土。他们之间绝对是陌生的，但她的笑容却绝对熟识。她从哪儿来？她又将消失在哪个街区哪个楼群哪个门洞的哪扇窗户后头……街上有人在装修店面招牌。有人在第五律师事务所门前炸油条。有两个人，或者更多，呆呆地站在油锅旁边。带着拖挂的手扶拖拉机突突地喷着黑烟，灰烟，黄烟，红烟，或者黄黄红红的杂合烟，而它们那些不同年龄段的操作手们则穿着各色各样廉价的皱皱巴巴脏兮兮的西服或运动服或对襟大褂，让沾满泥巴的拖拉机集群铺天盖地、陆续不断地向城区拥来，酷似当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兵分了一百二十路。真的很难说。

八

他问自己：真的回章台去当这代理市长？

桑塔纳终于开出了市区。公路旁阔叶杨林立。车里十分黝暗。我们勉强能看到黄江北斜倚在后座的椅背上忧郁地睁大着眼睛，注视着车窗外平淡无奇的景色。而后，车子沿着窄小而拥挤的码头街开去，不一会儿，便在一个嘈杂肮脏的内河码头旁停了下来。他寻找一个有一百二十

级台阶的岸坡，走了下去。古旧的砖砌台阶残破了，洇出深色的水迹，覆盖着深色的苍苔。苍苔里居然开出一星星鲜黄的小花。他继续往下走。左面有一段陡峭的岸壁。右面也有一段陡峭的岸壁。岸壁的砖缝里长出几棵并不太粗的黄果树，黑疏的枝丫奇崛地向水面上的漩涡里伸去，有时还伸得很斜很远。这儿的风有一股咸味，有一股腥味，格外地潮湿，也格外地阴凉。岸壁上有几家仿古的茶馆，吊脚楼似的，探出到水面上。从仿古的窗棂里传出充满各种现代欲望的旋律。他还看到一截生锈的铁皮烟筒管，滴下的烟油，像一些只留下影迹的枯藤，黑黄地游延在粉白的砖墙上。很多年来，他总是喜欢到这儿来站一站。跟水走得近一点。跟一段古老的砖墙走得近一点。听到什么。想到什么。得到得不到的。找回再也失不去的。很静地站一站。

章台近来连续不断出事，不说人心惶惶，也可说人心浮躁。

葛老师的女儿跑了。她有二十四五岁了吧。一个很有头脑的女孩。突然出走。章台最大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万方汽车工业总公司，破土动工数年，国家连着追加投资好几个亿，至今仍不能正式投产。作为总公司的中方总经理的葛老师，据说都急病了。而后是董秀娟的死。孙书记说，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中央领导已经在议论万方了。万方再投不了产，这屁股就要打到省委一班人身上来了。确实也该打了。董秀娟的死和万方迟迟投不了产有关系吗？葛平的出走仅仅是一个女孩青春常见的精神障碍？永远那样从容地走过马路，牵一条华丽而又可爱的小狗，穿一身白色的绵绸睡衣？究竟出了什么事？据说董秀娟是服毒身亡的。真的？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堂堂一个市长，非正常死亡十多天之后，居然还没有闹清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岂不让天下人笑掉大牙？任何一个市级公安局的刑侦和法医水平都不会差劲到这个地步。

是因为有人需要这种“搞不清”？

谁的需要？

什么样的需要？

如果说需要，那么能不能说董秀娟的死，也是“有人需要她在这个

时候死去”？好像章台市不少的老百姓都在背后这么嘀咕。

一个市长的死，无论是自杀，还是他杀，其背后必定牵涉到一长串地位身份都足够特殊的人。这应该说是常识。他们是谁？究竟为了什么，才会把这个“前劳模”女市长逼进了非正常死亡的胡同里？为了什么？

九

燥热。

十

灰黑色的江水涌动着，哗哗地拍打着那坚固的岸坡。一些老旧的平底驳轮拖着一长串运货的木船，推开那浓稠的波纹，在江面上缓缓地行进。江对岸矗立着一块巨大的标志牌，标志牌上画着一个巨大的箭头，血红地指着江底。箭头上方赫然写着这样几个醒目的黑漆大字：过江电缆。因为天色已经阴了下来，因为风推过来一团团雾似的高密度潮气，对岸那些低矮的老式建筑物和高高低低圆圆扁扁的树丛一时间都模糊了起来，不约而同地在风中一起若隐若现，仿佛在晃动，又仿佛在抻拉。码头街上，人来车往。那些个体小餐馆、小百货商店，竞相通过各自竖在门口的或大或小的音箱，拼命地吼叫着“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或者“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而在街背后那座幽暗深邃的圣约瑟小教堂里，则人头簇拥，烛光荧荧，管风琴庄严而恢弘地演奏着《婚礼进行曲》。祭台前跪着十二个年轻的姑娘，这里正在为这些女教徒举行矢发圣愿仪式。在十字架上深罹苦难的耶稣，半是欣慰半是无奈地望着教堂

幽暗的房顶。祭台上放着十二套黑色的修女服，还放着十二顶雪白的花冠。这些都是为这十二个年轻的女教徒与基督净配而预备下的。

十一

半个小时前，省委办公厅的徐秘书蹑着脚悄悄走进会议室，低声告诉黄江北，章台有个叫卢华的女同志打电话来找他，还留下个电话号码，请他无论如何尽快给她回个电话，她有十万火急的事要找他。

卢华就是葛老师的妻子，葛平的母亲。

她说，昨天夜间，有人在码头街上看到葛平。

葛平就是她那出走的女儿，那个刚从外国语学院毕业才两年的高才生。

江北，你是平平平日里最信得过、最愿接近的人。也许你出面，能劝她回来。帮帮忙吧，我知道不该拿这样的家庭琐事来打扰你这样的高级领导，可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看在老葛的面子上，看在平平一向以来对你的那种至诚至高的信任上，你出动一下吧。她说。

卢华说得对。二十七八年之前，老葛，葛会元，这个章台市当年唯一一个既到过美国又到过德国，后又被国家机械工业部留用的机械专家，由于当时那种可以想见的原因，从北京被打发回原籍，在章台五公区第三中学当数学老师兼教物理。后来当过几年校长，不仅教过黄江北那一代人，也教过自己女儿。在经常出入自己家门的那些师兄中间，葛平最敬重黄江北。敬重的原因是人多的时候这位师兄从来不在老师面前争着说什么做什么，等他来说来做的时候，往往是没人来说没人来做偏偏父亲又最需要有人来商量来帮忙的时候。说完了做完了帮完了老师的忙，他从不拿自己做过的说过的起了作用的这些事在师兄妹中间炫耀。但他不炫耀，她却偏偏忘不了。他的确像一个大哥哥。可靠，贴心。她从来没有过哥哥。她太想有一个哥哥。

十二

其实，在许多方面，葛平比师兄黄江北更冷静理智。高高的个儿，平平淡淡地笑。总是一副好女孩的模样儿，让大院里所有的老头老太太揪心揪肝地喜欢。在人们的印象里，她好像永远穿着那样一条干干净净的石灰蓝的牛仔裤，让人奇怪的是，她总是拒绝穿裙子，特别不喜欢穿超短裙。按说她这年龄正是穿超短裙的最佳时候。她有一千条理由炫耀自己那两条天赋绝色的长腿，但她就像黄江北一样天生地不愿炫耀自己。不愿炫耀偏偏被人注目，这也是常事。当然，这里得有个前提，就是他或她身上得有真东西，得真出绝活儿。再穿一件特别肥大的本色亚麻衬衫，一直搭拉到膝盖上，白袜子，然后是一双非常高档的白色休闲鞋。无论在什么样的人群中，你看她时，她都像千里湖面上那片唯一的白帆。

爱谁谁吧。

十三

雨终于下开了。

没有回答。只有渐渐增大的风哗哗地越过码头街那些陈旧的房顶，击打停泊在江边滩头上的那些木制货船，击打小教堂那灰色的尖顶，击打拼命摇摆着的大树，击打江两岸这片起伏不平的土地。云层越加厚重，翻滚着扑涌过来。一扇窗户忙关了起来。第二扇窗户也慌慌地关了起来。接着便是第三扇、第四扇……